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教育教学系列丛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治校 / 治教 / 治学

■ 主编 吴庆宪 ■ 副主编 张辉 樊泽恒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科教育教学系列丛书编委会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教育教学系列丛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治校 / 治教 / 治学

■ 主编 吴庆宪 ■ 副主编 张辉 樊泽恒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科教育教学系列丛书编委会

序 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座落在钟灵毓秀、虎踞龙盘的历史文化古都南京,创建于1952年10月。建校50多年来,学校实现了一次次历史性跨越,现已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多学科协调发展,具有航空、航天、民航特色的重点大学,进入了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新阶段。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2006年4月学校将迎来教育部专家组进校对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遵循“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评估指导方针,学校在近三年的评建工作中,以全面建设优秀本科教育,着力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办学理念进一步凝炼,师资队伍进一步提升,教学条件进一步改善,教学体系进一步优化,教学管理进一步规范,学风建设进一步加强,教学效果进一步提高,办学特色进一步明确,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了充分展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教学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我们编辑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系列丛书》,全书共有28册,每一分册围绕一个专题,采用汇集、选编、节选、实录等多种形式精心编选。内容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是学校在治校、治教和治学、教学改革与创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探索实践;二是学校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条件建设、教学管理和学生教育管理、学生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成果;三是优秀教师、优秀学生、杰出校友、学术带头人的风采。我认为,这套丛书虽然不足以全面反映南航54年发展历史所沉淀的深厚文化底蕴、优良的办学传统和浓郁的育人氛围,但可作为一个窗口向读者展现南航人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风格,创建具有国防科技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雄心。

智周万物惟创造,道济天下展经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发展是新中国半个世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以其鲜明的办学特色,雄厚的教学、科研实力,令人瞩目的成果享誉社会。我们相信,在各级领导、社会各届人士、海内外校友的热忱支持下,南航人一定能够把学校建设得更加辉煌!

凡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置于您手中的这套丛书一定还有许多疏漏和失当之处,伏祈不吝赐教!

胡海岩

二〇〇六年四月八日

前 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长期坚持科学治校、从严治教、严谨治学,形成了“团结、俭朴、唯实、创新”的校风,积淀出“智周万物,道济天下”的校训。正是在校风的熏陶下,校训的激励下,一代代的南航人负重奋进,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勇于创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学校已成为具航空、航天、民航“三航”特色,进入国家“211 工程”的全国重点大学,并正在向具有国防科技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展。

学校始终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以教学质量为学校的生命线,不断强化质量意识,创新质量观念。50 多年的办学历史已沉淀出“办一流大学、出高质量成果”的质量观和质量意识。始终坚持从严治教、严谨治学,加强校风、教风和学风建设,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制度为保证、激励为牵引,围绕我校人才培养目标,狠抓落实、措施得力,努力创建优良教风、学风。在全校教师中已树立了“师德为先,育人为本,敬业爱生”的师德理念,逐步形成了“厚德、博学、严谨、善教”的教风;广大学生自觉地遵守校纪校规,端正学习态度,积极进取,勤奋向学,奉献报国,热爱国防,勇于创新,立志成才,树立远大理想和目标已蔚然成风。

在长期的治校、治教、治学过程中,学校十分重视教育教学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始终将教育思想置于首要位置,坚持用正确的思想来指导行动。学校于 1986 年与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三校发起的每两年一次“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在高教界已具影响;学校从制度和经费等多方面组织、支持和保障教师、管理人员开展教育思想、理论的研究,多次举办了大学教育思想大讨论,极大地调动了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学校充分利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每年出版 1—2 期高等教育研究专辑,鼓励教师在公开出版的教育科学类刊物发表研究成果。近年来,学校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丰硕。

这里,我们主要从校外公开出版的刊物(重点是从核心类刊物)上选取近两三年来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校领导的教育研究成果汇编成《教育思想办学理念治校方略》文集,这里未收入),从治校、治教、治学三个维度,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学校管理、创新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研究生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性教学等七个层面汇编成集。

在采选和汇编过程中,尽管进行了大量的甄选工作,但由于研究成果量多面广,加上编者水平所限,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6 年 2 月

目 录

高等教育基本理论

制度环境与大学组织的现代性

——制度环境变迁与中国现代大学的曲折发展	孔垂谦(1)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反思与对策	樊泽恒(10)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价值取向	张 辉(18)
回归与发展:对素质教育的一种诠释	樊泽恒 程永波(24)
高校教育研究机构“上浮”、“下沉”现象透视	张 辉(30)
素质教育与教育随想	聂东林(36)
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基础——适应性教育	刘伟清(39)
中国传统教育历程、思想特征及其现代启示	汪明芳(44)
现代教育发展的心理和生理基础分析	于龙才(51)
产学研合作教育的理论基础与时代特征新探	李雪飞(55)
西方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独立性探析	孔垂谦(62)
高校自律、社会监督:高校自主招生的环境研究	王亚彤(67)
西方现代大学学术自治的制度环境基础:一种政治社会学分析	孔垂谦(73)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去工程化”困境与“情境化”选择	孔垂谦(83)
世界精神的嬗变与追求: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思索	李雪飞(88)

高等学校管理

战略型应成为新世纪教育规划的重要特征	张 辉(94)
论高等学校的自我定位与个性化发展	毛景焕(99)
竞争机制引入高校内部管理的政策研究	张 辉(107)
提高高校管理有效性的关键在于创新	樊泽恒(113)
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的管理学阐释	张 辉(118)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路径选择	孔垂谦(124)
高校自主办学与高校管理有效性	张 辉(131)
浅析高校干部定量考核	刘健荣(137)
高校工作绩效评估体系研究	王鲁捷(139)
高校教师素质评价体系构建	张金卫(145)

素质教育评价的应然性及其现实化	樊泽恒(149)
论新型高校招生评价体系的构建	王亚彤(155)
浅谈提高高校管理人员的信息素质	谭白磊(160)
高校学生诚信行为选择的博弈分析	庞小燕(163)
高等院校科技创新团队建设研究	沈建新(169)
中国大学建立多元化教师聘用体系	李雪飞(176)
谈大学生能否顺利就业对高校招生工作的影响	王亚彤(181)
论品牌(特色)专业与高校核心竞争力	张金贵(185)
高校新校区后勤工作的几点思考	黄炳辉(191)

创新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愈演愈烈的全球人才争夺战与我国的对策	刘思峰(194)
大学素质教育与创造教育	张 辉 樊泽恒 许丽玉(199)
利用计算机网络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樊泽恒(204)
知识经济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程永波(208)
德育视野中的创新人才培养	平 旭(213)
有效开展网络化学习的“五自”原则	樊泽恒(217)
定量方法(模型、预测、决策)精品课程群教学改革探索	刘思峰(222)

研究生教育

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高校研究生创新能力研究	王锐兰(230)
研究生教育督导制度实施的环节与作用	刘丽琳(235)
研究生教学督导制度及其在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中的作用	刘丽琳(237)
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目标模式选择	程永波(242)
对工程硕士研究生创新培养工作的思考	王 伟(246)
论研究生教育质量观与发展目标模式	程永波(250)
研究型大学发展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思辨	殷宏健(255)
关于高校学科建设的理论探讨	程永波(262)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初探	王 伟(269)

思想政治工作

知识经济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刍议	段进东(273)
-------------------------	----------

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	平 旭(279)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策略	李 遥(282)
学生职业生涯设计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系	黄炳辉(287)
试论国防教育与德育的整合	张晓兵(293)
构建新型“两课”教育管理体制	冯绍红(298)
思想政治工作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切入点	左云飞(302)
专业化发展:高校学生工作势之必然	冯绍红(307)
增强两校“两课”教学的有效性	平 旭(313)
高校新校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黄炳辉(317)

人才培养模式

高等工科院校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刘益平(322)
以研究性教学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朱 飞(326)
紧密联系实际进行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段进东(329)
论网络教育环境下的教学观	樊泽恒(334)
校园网络文化功用的实现途径	诸 峥(340)
终身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	张 辉(343)
探索研究型课程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工程实践与科技创新能力	王友仁(347)
探索“研究主导型”本科教学模式	童明波(353)
人才强国战略下的工科拔尖人才培养模式	江 山(357)
基于自主学习的网络教学策略设计	樊泽恒(364)
专业基础课双语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与思考	臧春华(372)
大学教学观念变革的实践基点	孔垂谦(376)
建立新的机制实现产学研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陈 旭(383)

实践性教学

构建新的工程训练教学体系	陈 旭(387)
构建实验教学新观念新体系	王治先(392)
优化高校实验技术队伍结构的对策研究	王治先(396)
加强开放式实验教学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葛玉兰(400)
提高实验教学效果之实践	龚余才(404)

制度环境与大学组织的现代性

——制度环境变迁与中国现代大学的曲折发展

孔垂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6)

摘 要:大学是学术性社会组织,建立相对完善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是现代大学学术繁荣的基本保证,而大学组织的现代性与社会制度环境的现代性具有共生共荣性。中国现代大学的百年历程表明,大学发展对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需求与社会制度环境对这种需求的满足之间是否协调,是大学学术能否兴盛的关键,推进制度环境的创新是当代中国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环境;大学制度;学术发展

中图分类号:6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4)02-0107-07

中国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却是西方的“舶来品”,是在西学东渐潮流的冲击下,在中国近代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典型的“后发外生”性。一般认为,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及1904年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始,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比西方晚了800年。在中国近代引入西方大学这一“建制化”的学术组织之时,作为整体的西方现代大学已经具备了成熟的组织形态。这种“成熟”不仅表现为大学组织形式的“定型化”,更表现为大学组织个性即学术性的日益彰显和作为大学之灵魂、大学学术发展之基础的大学自治(大学主体性)、学术自由(学术主体性)以及“教授治校”,(教师主体性)等现代大学制度的普遍认同和广为实践。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为核心的大学制度体系,既是大学学术性特征和大学之为“大学”的具体体现,也是大学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这已为西方现代大学的发展史所证明。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虽然大学的社会存在方式或生存状态从来就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决定的,但现代大学作为人类创造的以培养人才、发现真理为己任的学术组织,具有超越时代和国度的组织个性,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普适

作者简介:孔垂谦,河南信阳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管理。

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特巴赫教授认为,“作为现代社会的教育机构,大学显示出了相当长的持久性。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保持着传统模式中的主要因素”,“‘学院气质’经受了严峻考验,在某些方面遭到了削弱,但是,它仍然存活下来了”^[1]。在特定的国家和时代,大学组织的制度环境—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教育制度(含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传统)以及与之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国家高等教育体制,对大学学术个性、“学院气质”等的包容程度,直接影响着大学的发展。19世纪法国大学的颓废,正是过于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大学的“学院气质”几近丧失和大学“政治化”、“工具化”的结果。我国自清末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以来,社会制度环境经历了几次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时期大学的社会存在方式的历史透视,寻觅中国现代大学曲折发展的社会根源,以期对当代中国大学的制度环境现状及其变革趋势有一个全局性的把握。

一、清末的中国大学:有形无神,学术有名无实

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粉碎了清王朝的“天朝大国”迷梦。这一时期既是中国社会日益殖民化的时期,也是中国反躬自省、客观审视西方文明、引进西学以救亡图存的时期,西方文明强烈的“示范效应”推动清末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此时的“西学东渐”实是中国社会对西方文明挑战的被动回应,这也决定了“西学东渐”的逐步深入的阶段性特征。梁启超曾把中国学习西方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自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自五四运动以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2]。与此相对应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学习西方的最初动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创办的以培养“洋务运动”所需要的“艺才”、“专才”的西式学堂应运而生。这些洋务学堂虽不是严格意义的高等学校,但它大大动摇了封建传统教育的社会观念基础,为中国现代大学的产生准备了社会条件。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社会主流文化中的“西学”方向由“器物”转到“制度”层面,维新变法运动推动了完全有别于传统教育制度的完备的西方高等教育制度的引入,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即是维新变法思潮的产物。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共有官立高等学校120余所。

不可否认,清末中国大学虽嫌稚嫩,但毕竟已初具西方现代大学的雏形,有明显的“新学”特征。根据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第一个经中央政府制定并在全中国范围内实际执行的学制—《癸卯学制》,高等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三类。普通高等教育分为三级,即高等学校或大学预备科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大学堂又分为经济、政治、文学、医、格致、农艺、工、商等8科。设立在京师的大学堂必须8科齐备,设立在省会的至少设置3科。通儒院以研究为主,只设在京师

大学堂内。与此相适应,新式大学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已经成为高等学堂或大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也大量出版。借此,西方的教育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教育内容才得以在中国建立和传播,封建教育制度的根基已经开始崩溃。

但是,来自异质文化的作为制度文明产物的现代大学,是由封建专制的清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被迫引入的。“寄生”于封建专制国家“机体”内的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貌合神离”是必然的。在清政府看来,大学不过是服务政治需要和国家目标的“工具”,“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学问为手段”^[3]。国家政府对全国大学实行集权控制,这与中国封建社会千年来的传统教育制度是一脉相承的。“政教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政治与教育的高度统一,教育的政治功能受到高度重视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征。“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圣贤遗训,明确规定了教育为治国治民服务的宗旨^[4]。从西周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即形成了“学在官府”或“学术官守”的教育主流传统,教育机构设于官府之中,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不分,学校的教师由国家官吏充任。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王国都十分重视教育,视学校为“教化之本原”和培养“治才”的重要工具。两汉时期的太学,既是国立高等学府,又是中央教育行政机关。自隋唐以后,封建国家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统一颁布标准教材,统一考试内容和方法,统一选拔人才的标准,把各级国立学校以及书院等的教育宗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纳入统一的轨道,实现了教育的大一统。封建专制国家据此既实现了对学校教育的直接控制,也钳制了学术的自由发展。“学而优则仕”成为读书人的主导观念,读书人的“官本位”意识、学术对政治的依附性格直接导致了中国学问传统中“人统”与“事统”高扬,而“学统”无法彰显。在这样的社会制度环境下,清末中国大学的生存境遇可想而知:大学只是封建国家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独立的主体地位,我国第一所明确以“大学”为称的京师大学堂,在建校之初既是国立最高学府,又是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实际上是“近代版”的“太学”或“国子监”。以培养“忠君尊孔,兼通西学的封建官僚”为目标的清末大学,只能是国家政府强权的附庸和“工具”,而不可能享有西方现代大学的“学术自治”权利;封建集权控制下的大学从来就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作为工具的“学术”只能是服务于功利的目的而非学术的追求。为服务封建统治的需要,清政府一方面保持、保证了经学科在大学堂的绝对主导地位,同时对“新学术”实行严格控制,于“体”有害之“用”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学术的功利化、政治化只能导致大学学术主体性和学术精神的缺失,新型学术很难发展;在封建国家专制控制下,大学的“政治工具”地位既决定了大学主体地位与学术自由观念失去制度保障,也决定大学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以科层式的管理保证大学发展的国家意志。教师无论是个体还

是群体,既无参与学术管理的权利意识,也无相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在清末封建衙门式的大学中,教师是在学术管理权力之外的。

显然,清末中国大学虽然实现了中国现代大学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但由于当时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依然起着支撑作用,主导清末大学的办学思想和管理原则仍具有浓厚的封建专制特征,清末中国大学只能是“形式上”的现代大学。

二、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形神兼备,学术繁荣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一大批深受西方文明熏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致力政治制度变革的同时,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主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观念,试图以“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又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政治制度的民主、政治对文化教育集权控制的削弱,既为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和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又为中国大学从清末“衙门式”大学走向现代化大学提供了可能。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党专政的 10 多年间,由于政局不稳,政府控制最为松弛,从封建专制控制中走出来的中国大学,迅速走上了改革之路。对此,加拿大学者露丝·海霍教授一语道破:“1911 年到 1927 年,这一时期革命四起,随后整个中国陷入了一片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这就给各地高等教育在政策、法规及其实施上进行实验提供了很大的空间。”^[5]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即成立了教育部,积极推行教育改革,通过两个学制(即 1913 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和 1922 年“壬戌学制”)的颁布实施和深具人格魅力的大学校长的身体力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性质。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教育改革赋予中国大学以真正的现代内涵,它既确立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的教育目标,明确了大学的“学术组织”定位(非官僚养成所),倡导“学术独立”,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同时确立了大学教授在大学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实行“教授治校”制度。新北京大学所呈现的勃勃生机推动了中国大学的现代转型。不可否认的是,蔡元培的北大改革之所以能收一时之效,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当时软弱无力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非集权控制”,这个阶段政府对教育事务实际上是有心无力的。正因为如此,蔡元培才有可能在封建积习沉重的北京大学推行前所未有的改革,并倡导“教育独立”,疾呼“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政党外”。同时,蔡元培北京大学改革的成功和后来“大学区制改革”失败的鲜明比照,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教育改革的成败与社会制度环境的性质休戚相关。正是国民党独裁政治和“党化教育”政策,使得民国时期的“教育独立”运动昙花一现。国民党南京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条例,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控制,明确规定中国的教育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教育。但由于在国民党专制统治的 20 余年,一方面内忧外患不断,国民党政

府无力对大学的内部事务实施强制控制；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思想仍是这一时期的社会主流观念。因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大学，在政府的法令规定的范围内，仍享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利，私立大学尤其如此。战火纷飞中的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其辉煌的学术成就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据台湾《学府征闻》介绍，台湾拥有的8位国际第一流工程师中7位毕业于西南联大；现在美国工作、被美国学术界誉为国际第一流学者的任之恭、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林家翘（现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应用数学学会会长）、吴大猷、牛满江等都是联大的教师或学生^[6]。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取得中国“超级大学”的赞誉，固然与民族危亡关头所迸发的爱国精神、改革拼搏精神以及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人才优势于一炉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民国以来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氛围为中国大学在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创新方面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形神兼备”的现代大学必能孕育出学术的“累累硕果”。在西南联大，这种“现代性”主要表现为：第一，大学具有相对独立自主的办学权利。不同于清末大学，民国时期在民主、科学精神的推动下，中国大学逐步走出封建国家专制控制的阴霾，大学组织的学术个性在一大批坚持独立自由办学理念的学者和大学校长的倡导和维护之下，日益获得社会（包括政府）的认同和尊重。学术独立、学术理应独立的观念在“既没有学术自主权之说，也不存在学术自由思想”传统的中国大学播下了种子。在西南联大，这种“种子”在学者们的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根据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大学规程》（1929年）、《大学组织法》（1929年）和修订的《大学组织法》（1934年），国立大学实行董事会，校长和由教授为主组成的评议会、教授会分工负责的内部管理制度，学校事务尤其是学术事务由学校依章程自主决定。正是这种相对自主的办学生态环境培育了民国时期我国现代大学史上异彩纷呈的个性化教育理念与多样化教育实践，也成就了梅贻琦、潘光旦、唐文治、张伯苓、竺可桢、郭秉文等一大批颇具现代办学理念的教育家。第二，大学依靠广大教师，实行民主治学。在梅贻琦的领导下，西南联大建立了教授治校、民主决策的制度，凡是大政方针、教学、科研和主要行政工作以及对外事务等重大问题，都通过教授会审议后才最后做出决定；在校长支持下，组成了以教授代表为主，吸收有关行政负责人参加的校务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处理学校经常性工作。而且凡是事关学校发展的重大决策或举措，无不在广泛听取教职员的意见，尤其是广大教师意见的基础上，才通过教授会或校务委员会做出正式决定，保证学校决策的充分民主。同时，为了保证学术决策的有效实施，学校设置了各种专门委员会，以教授一人为主席，制定实施计划，指导、督促有关行政部门落实办理，执行权属于校长统一领导下的各专门委员会，而行政部门或教学辅助机构则履行服务职能；同样，在实行学院制的西南联大，各院有院务委员会，各系有教授会。这种权能分开而又密切结合的学术管理制度，充分保证了学校发展的学术主导、教师主体地位，使学校管理走上了统一、高效、灵活的轨道。第三，大学

实行“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思想。西南联大坚持学术自由,视学术自由为大学学术发展和服务国家长远利益的前提条件。学校为不同观点的学术之间的自由探讨、交流与碰撞提供广阔舞台,为学术发展营造浓郁的整体氛围。一方面在教师的选聘上坚持“学术至上、师德为重”的标准,只要教师胜任教学、科研成果突出,定能被聘任或续聘。联大8年中,从未因政治思想等问题批判处理过一个教工和学生,在教师中既有像闻一多、张若奚、吴晗等那样直接反对蒋介石的进步教授,也有吹捧帝王之术的御用哲学家和战国策派人物,还有身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教授专家。另一方面,学校鼓励不同学派观点的教师开设课程,在课堂上各抒己见,将自己的观点新知应用于教学之中。“一些造诣很深的教授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这在联大可说是被师生共同称道的一种风尚。文人相轻的不良习气,在这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从而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和求是民主的学风。”^[7]

民国时期的中国现代大学尤其是西南联大的成功实践证明,现代大学作为学术组织之一,之所以能成为培养学术人才、促进学术发展的“重镇”,关键在于满足大学学术个性发展需求和有利于弘扬大学学术精神的制度安排的“定型化”,在于国家政府“非集权控制”的社会制度环境为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完善提供了相对坚实的制度平台。正是由于外在控制力量的软弱分散,大学知识之花才开得绚丽多彩。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大学:历经坎坷形神趋合,学术发展渐入佳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统一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建立,理应为中国大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但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艰难曲折中发展,中国现代大学也在饱受磨难之后终于重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其间经历了50年代初期“全面学苏”与“院系调整”,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和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大调整,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停课闹革命、树白卷英雄以及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体制的持续变革。政治体制与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深深地影响到大学的社会存在方式,左右着大学的发展进程。历史事实清晰地“再现”了制度环境对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新中国建立时期的特殊国际国内环境以及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贯穿和渗透于国家全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国政府对社会生活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控制,独立于政治权力和政府权力之外的社会自治权力是不存在的。这种对社会的无限控制

直接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形成：国家政府权力无限膨胀，社会组织丧失自我管理权利，自我管理功能萎缩。作为社会组织的大学同样被置于党和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形同国家政府的附属机构，而不是具有独特个性的学术性组织，大学组织的政治化与行政化在所难免。早在1950年在政务院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中即强调指出：“凡中央教育部所颁布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政策与制度，高等学校法规，关于教育原则方面的指示，以及对于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或停办，大学校长、专门学院院长以及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免，教师学生的待遇，经费开支的标准等决定，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中央和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有关部门直接领导有关高等学校的日常行政、教师调整配备、经费管理、设备及参观实习等事宜。”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更是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必须与中央人民政府各有关业务部门密切配合，有步骤地对全国高等学校实行统一与集中的领导”。根据中央政府有关部门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如《高等教育管理暂行规程》（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196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拥有了决定事关大学发展一切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大学具体实施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成为实现国家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极其重视对大学的领导。建国之初，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提上议事日程，同时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取代三民主义教育，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8]。为了保证党对大学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接收与接办旧中国大学的过程中即参与大学领导工作，建立政治工作机构。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9]同时，党通过完备的党委领导体制实现了对大学的直接领导：“通过地方党委、中央政府各部门党委（组）和大学党委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决议，并通过党组织的监督保证和积极参与，完成党的各项任务”。^[10]与此相伴的是，大学愈来愈成为党的政治机关，政治的起伏波动直接影响大学的命运。事实上，到“文革”结束时，政治主宰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几近崩溃的边缘。

可以这样认为，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国家化特征。学者们将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典型特征概括为：高等学校国家所有、教育管理高度集中、教育发展受计划调控和教育运行行政干预^[11]。在这一制度环境下的中国大学，既无法获得社会主体地位和学术组织理应具有的学术自治与自由权利，也不

可能在行政权力主导一切的组织内部建立以学术人员为中心、以学术发展为目标导向的遵循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制度体系。因而,“供给型”的中国大学丧失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自然也就丧失了学术组织应有的生命活力。它可以培养出大量社会急需的“模式化”的“现成”人才,却难以造就独具个性和创造精神的创造性人才,难以做出原创性的科研成果。

中国现代大学重获生机的历史机遇始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古老的中国逐渐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文明,由“国家社会”走向国家与社会二元化的“公民社会”,国家政府权力不断分散,社会自我管理权力不断增强,直接引发了国家政府主导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根本性变革。1985年,随着经济体制的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入,党中央做出了改革教育体制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弊端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提出“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根据1986年国务院正式颁布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在国家政府各部门(中央政府各部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体制内合理分权的同时,将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的权力关系调整置于改革的中心,大学的办学主体地位受到关注和重视。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同时,提出了“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的改革目标,通过立法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促进高等学校建立起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从1993年至2001年,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体制内的改革目标基本完成,高等学校的隶属关系基本理顺,“条块分割”与重复办学的结构格局已经基本改变,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领域正在发挥“增强办学活力,提高效率与效益”的积极作用。1998年高教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高等学校法人主体地位和7个方面办学自主权。应该说,这一时期中国大学的社会制度环境明显改善,大学也拥有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办学自主权,学术水平显著提高。我国政府也正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但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大学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步履维艰,突破性进展的最大障碍仍是社会制度环境的体制性制约。没有制度环境的进一步优化,大学自身的重大变革难收实效,大学难以真正建立起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生命机制。

纵观中国现代大学的百年历程,植根于几千年集权主义政治传统、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一统天下的中国社会,中国现代大学一直具有国家高度集权控制的典型特征:

大学发展高度依赖国家政府,政治化倾向鲜明。政治的晴雨表就成了政府的晴雨表,政府的晴雨表又成了高等教育政策的晴雨表,超经济政治体制左右着大学的生存与发展。正如学者刘海峰所言:“从古至今,中国的高等教育都受到政治的强大制约,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抑扬顿挫明显地与政治风波密切相关……像中国高等教育大起大落的现象,在一般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中是罕见的。”^[12]推进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社会制度环境的创新,既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客观需要,这已经为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参考文献:

- [1] 菲利普·阿特巴赫. 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 走向 2000 年[J]. 教育展望, 1991, (2): 48.
- [2] 刘世军. 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35
- [3]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89.
- [4] 田正平等. 模式的转换与传统的调适[J]. 高等教育研究, 2001, (2): 94.
- [5] [加拿大] 许美德著, 许洁英主译. 中国大学 1895 - 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53.
- [6] 洪德铭. 西南联大的精神和办学特色[J]. 载华中理工大学高教所编. 高教研究简报, 1997, (10).
- [7] 洪德铭. 西南联大的精神和办学特色[J]. 载华中理工大学高教所编. 高教研究简报, 1997, (10).
- [8] 田正平等. 模式的转换与传统的调适[M], 高等教育研究, 2001, (2): 94. [9] 何东昌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859. [10] 别敦荣. 中美大学学术管理[M].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0. 78.
- [11] 别敦荣. 中美大学学术管理[M].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0. 123.
- [12] 刘海峰.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起伏与进退[J] 现代大学教育, 2001, (2): 7

(原文刊载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 年第 4 期)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反思与对策

樊泽恒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6)

摘 要: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在我国实践过程中出现了理解上误差,影响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有效发展。事实上,马丁·特罗大众化理论形成的经验性及其背景的单一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有“约束条件”的理论;大众化理论中的数字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不具绝对意义;大众化形成主要是高等教育内外部矛盾运动的“自然”过程,是“质”“量”互动的结果,而非外在人为因素所致。在我国大众化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质”与“量”关系失调;单一化发展路径与应然性多样化相悖;教育质量与教育规模背反;“非均衡”发展与教育公平的冲突等矛盾。化解这些矛盾应坚持科学发展观,走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之路。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反思;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129(2004)03-0069-06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高等教育发展一种阶段形式,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实践过程中,大众化似乎成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代名词,大众化理论也成了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理论。“15%”指标象经济领域中人们追求“GDP指标”一样成为了教育领域的“GDP”,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由于政策变动过频,导致增速过快(大规模扩招),已出现令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问题。如何看待大众化发展及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行深刻反思,走出具我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解读

大众化理论一介绍到中国就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推崇(尽管有反面的意见),过分的崇拜使人们在对大众化理论理解和运用上出现了失误。“大众化理论本身并

作者简介:樊泽恒,安徽桐城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教育技术理论和高等教育管理。